

中国侨务公共外交的服务管理模式探析

——基于中国与华人高技术新移民的趋同利益

林逢春 吴婷

【摘要】 在崛起中国经济与文化的辐射下，以留学生、技术移民为主体的华人高技术新移民同祖国——中国的互动不断加强。这些具备“可携带技能”的新移民由于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和管理、技术而成为中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倚重力量。在这种跨国互动中，华人高技术新移民的利益与中国海外利益存在趋同点，而这种趋同利益可成为中国侨务公共外交制度化的依据。基于高技术新移民的跨国实践及其与中国的趋同利益，结合我国现有的移民管理制度现状，本文提出一种侨务公共外交的机制化服务管理模式：一是依托网络技术，建立与海外高技术新移民的联动机制；二是吸纳高技术移民，建设“外脑”智库；三是创建人才生活保障机制，提高行政服务水平。

【关键词】 海外利益；趋同利益；华人高技术新移民；侨务公共外交；服务管理模式

【作者简介】 林逢春，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吴婷，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An Analysis of the Service Management Patterns of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Public Diplomacy

By Lin Fengchun, Wu Ting

[Abstract] Due to China's economic and cultural ris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Chinese new high-tech immigrants, most of whom are overseas students and skilled migrants, is being increasingly strengthened. Since the new immigrants owning "portable skills" have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cross-culturally and master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techniques, the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reinvigorating China through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this cross-border interaction, the common interests between Chinese new immigrants of high technology and China can be a basis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public diplomacy. Based on the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of new high-tech immigrants and the convergence of interests, and combined with the

status of immig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this paper proposes a service management pattern for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public diplomacy: first, to establish a linkage mechanism with new overseas high-tech immigrants relying on the network technology; second, to attract highly skilled immigrants to develop a think tank; last, to create an insurance mechanism for talents improving the level of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Key Words] Overseas Interests; Convergence of Interests; Chinese New Immigrants of High Technology;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Public Diplomacy; Service Management Pattern

[Author] Lin Fengchun, Lecturer of 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 Ting, Ph. D student of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inan University.

2011年10月在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上国务委员戴秉国首次提出“侨务公共外交”。会上，国务院侨办提出了“十二五”时期，要“以‘以侨为桥——沟通中国与世界’为主线，加强侨务公共外交”，并在《国家侨务工作发展纲要（2011-2015年）》中明确“拓展侨务公共外交”在新时期侨务工作中的地位。¹自此，我国对于侨务公共外交的研究趋于升温。目前，国内学界主要围绕其内涵、理论内核、特征属性、影响因素、作用前景和实施路径等议题进行探讨。²国内对侨务公共外交的作用机理大致遵从这样的套路：立足侨情分析海外华侨华人的属性特点，并着眼于当前中国的海外利益保障和和平发展战略，谋划关于侨务公共外交的策略方向与路径办法。这种研究廓清了我国侨务公共外交战略的基本轮廓，但倘若考虑到该系统工程的有效性，则还需深入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现实中不同国家地区、代际和生存环境的华侨华人群体（包括同一国家地区内的不同阶层的华人群体）对中国认知的程度存在差异，于是根据不同华人群体与华的利益互动情况而谋划因应的侨务公共外交模式显得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对于“新概念，老做法”的侨务公共外交研究，国内至今也缺乏对其实施模式的提炼、归类与效果评估。本文结合那些具有可携带技能的华人高技术移民同中国利益互动情况，着重分析该群体与中国的趋同利益和利益认知分歧；在此基础上，探寻具有可行性的侨务公共外交模式。

一、华人高技术移民与中国海外利益的关系分析

¹ 谢萍：《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首提“侨务公共外交”》，中国新闻网，2011年10月21日，<http://www.chinanews.com/zgqi/2011/10-21/3406592.shtml>。

² 主要代表作品有：金正昆、臧红岩《当代中国侨务公共外交探析》，《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2页；王伟男：《侨务公共外交：理论建构的尝试》，《国际展望》，2012年第5期，第30-35页；金正昆、孙冰冰：《海外华侨华人参与：当代中国侨务公共外交路径研究》，《社科纵横》，2012年第11期，第38-39页；隆德新、林逢春：《侨务公共外交：理论内核、本体特征与效用函数》，《东南亚研究》，2013年5期，第88页；赵可金、刘思如：《中国侨务公共外交的兴起》，《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5期，第17-18页；孙霞：《中国海外利益的政治风险与侨务公共外交》，《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22-25页；龙潮起：《侨务公共外交：内涵界定与特点辨析》，《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3期，第66-69页。

（一）中国海外利益的内涵与层次

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日渐频繁，中国国家利益的内涵也在不断拓展。国家利益已经突破传统地理疆界，向世界各个角落扩展。国家利益是国内利益和海外利益的集合，国家的海外利益是国内利益在境外的延伸，它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利益。从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海外利益的消长动态事实上离不开海外华侨华人因素；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态势使得从中国大陆移居出去的海外新移民（又称新华侨）与祖国增加了跨国互动。全球化背景下两者的互动给中国与新移民带来了相关的利益，但也因为伴随全球化进程而来的不确定因素而遭受风险。因此，在探究中国海外利益的涵义及其保障路径时势必考虑到海外移民因素。

中国海外利益指的是中国在国际交往和对外经济合作过程中所形成的、并存在于中国主权领土之外的国家、企业、社会组织、公民和海外移民等行为体的利益综合。由于中国在海外的利益涉及到海外移民等不同的利益行为体及其族群身份认知，所以在国家、企业和个人等三个层面的利益划分上需要考虑到华人华侨的族群文化发展动向和利益需求层次。笔者由此所界定的中国海外利益不仅包括国家层面的核心利益，即确保国家政治制度稳定、领土主权完整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之外，还包括中国的国家形象地位、驻外组织机构、企业、公民以及海外移民等在海外的人身和私有财产安全以及形象声誉。³（如表1）

表 1：中国海外利益分类

海外利益类别	政治利益	经济利益	文化利益
国家层面利益	政治制度的改革与政治稳定、领土与主权完整、国家形象	获取海外资源和拓展国际市场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	文化软实力
企业层面利益 (中国企业与华商)	企业生存、合法地位的认可	企业投资收益、经济效益	企业文化、品牌形象
个人层面利益 (公民与海外移民)	人身安全、合法权益的保障、人才培养	财产安全、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

注：表格的分类参考孙霞：《中国海外利益的政治风险与侨务公共外交》，《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

³ 对于中国海外利益与海外移民的关系论证可参见林逢春：《崛起中的中国与海外高端新移民的趋同利益探析——兼论中国侨务公共外交的因应策略》，《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25-26页。

自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移居出去的新移民达到 600 万，成为 4800 万世界华侨华人的重要构成部分。新移民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即留学生、技术移民、连锁移民和非法移民。⁴由于留学生与技术移民都具备“可携带技能者”在当地谋生发展，并且比较迅速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被称为“高技术新移民”（又称“高端移民”）；而连锁移民和非法移民由于英语和网络等知识技能相对匮乏、学历偏低而缓慢地融入主流社会，被称为“低端移民”。⁵对于留学生和技术移民为主体的高技术新移民，在海外新移民的总人数上占据着 64.6% 的比重；⁶而且该群体大部分人在中国成长，并大多在中国大陆完成了高等教育，尔后奔赴北美、欧洲和澳洲等发达国家与地区求发展。这些在中国完成了民族社会化的高技术移民，对祖籍国的国情和文化具有一定的认知。在海外谋发展的时候，民族文化强化了其在海外复杂环境下自强意识的生成；而在中国崛起的经济文化辐射下，这些追求改善经济条件和生活质量的高技术新移民对华国家形象表现出持续的关注。⁷

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政府通过“千人计划”和“春晖计划”等政策项目将海外高技术移民纳入人才强国战略轨迹。在中国政府的政策规划中，该群体包括公派或自费出国留学、学成在海外从事教学科研、工程研发和金融管理等工作并取得显赫成就，为国内急需的高级技术、管理人才和学科带头人，以及拥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发明专利等人才。⁸在中国政府看来，这些技术人才在海外积累了当前世界最新或最好的科学技术或管理经验，而这些人才的储备与环流有助于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⁹

（二）高技术新移民的利益认知：基于同崛起中国的互动

中国与高技术新移民在互动中的共同利益是新移民的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的前提。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国创设的互惠互利的环境对高技术新移民起到一定的辐射作用，这一群体在这种环境下不断地改善经济条件，实现个人价值，而高技术新移民也在同祖籍国中国的互

⁴ 刘宏：《当代华人新移民的跨国实践与人才环流——英国与新加坡的比较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65 页。

⁵ 对于新移民的分类可参见李其荣：《寻求生存方式的同一性——美加新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分析》，载《东南亚研究》，2008 年第 5 期，第 72 页；刘宏：《当代华人新移民的跨国实践与人才环流——英国与新加坡的比较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65-166 页。

⁶ 数据来自《中国国际移民报告：移民回流现象增多》，中国新闻网，2014 年 3 月 05 日，<http://edu.sina.com.cn/a/2014-03-05/1120240273.shtml>。

⁷ 参见 Ding Sheng, “Digital Diaspora and National Image Building: A New Perspective on Chinese Diaspora Study in the Age of China's Rise”, *Pacific Affairs*, Vol. 80, No. 648, 2007-2008; 柴玲：《论海外华人的中国认同》，《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0 年第 1 期，第 69 页。

⁸ 刘宏：《当代华人新移民的跨国实践与人才环流——英国与新加坡的比较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66 页。

⁹ Xin Fuliang, “The Basic Line of Thinking in Shanghai's Efforts to Attract Overseas Chinese Intellect”, *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 Vol. 34, No. 3, May/June 2001, p. 66.

动中发现、感知和获取个体利益。

在经济利益方面，高技术新移民希望在财产安全的前提下，抓住伴随中国崛起而来的经济机遇以获得经济收益。首先，对那些在华投资办厂的留学生而言，在华投资的设备、生产线等资产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是首要关切，而中国稳定发展的市场环境及不断完善的经济法规有利于其在华资产权益的保障；其次，随着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的深入，中国的海外商贸业务及产业链条得以纵深发展。一些留学生凭借其双语能力在跨国公司及其海外分支机构中实现职业生涯的提升。以日本的新华侨为例，他们运用中文和日语双语技能和中国文化在中日跨国企业中担任商务代表或跨国销售等重要岗位。有的新移民为了突破日本企业对移民群体设置的“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在积累一定的社会资本和工作经验后，利用中日两国间劳动力价格差，独力发展相近行业的对华商务。最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省会和沿海城市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趋于上升，相关硬件设施和用人待遇的不断完善。这些都是高技术移民职业生涯发展的重要条件。

在政治利益方面，中国的行政改革和良好的国家形象能够给正在争取政治平等地位的新移民以安全感和政治参与的动力。对那些已经取得永久居住权或归化入籍但依然受到歧视的新移民来说，由于居住国环境的“压抑”，促使他们诉诸族群认同以求得集体自尊。在日本和韩国的新华侨，他们不甘心因为居住国制度的约束而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社会位置，而希望祖国强大以满足其自尊。相反，在那些政治环境宽容的国家，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能够给予那些踊跃投身政治参与并致力于为华人社会谋福利的华人以良好的公众形象。总体上看，中国日下所致力于健全移民管理法规体系的改革措施，再加上各地方政府对海外人才的优惠政策。这些都符合来华就业创业或从事学术科技合作的新移民的切身利益。

在文化利益方面，基于中国文化强国战略而兴起的“中文热”及其带动的国际话语权的提升，高技术新移民及其子女掌握华文和振兴中华文化的热情不断提高。在崛起中国实施的文化“走出去”方略作用下，华语与中文的实用性得以凸显。这提升了新移民懂华文、用华文和办华文的社会文化价值。一是那些从事华语培训和掌握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新移民因为华语在国际商务中实用价值的提升而逐渐受到尊重；二是新移民因而注重对子女进行华文教育的培养，以秉承中华民族勤奋刻苦的精神和中西兼容的求学态度成就社会精英；三是由“中文热”所带动的话语国际地位的提升，增加了华文教育工作者在国内与政府博弈中的筹码。此外，在教育国际化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和科研水平水平逐步提高，高技术新移民更易于在中国大学和科研机构找到创新和成果推广的合作平台。

二、中国海外利益与华人高技术新移民利益的趋同点与认知差异

海外利益具有包容共生的属性,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的一条途径就是夯实和扩增中国与高技术新移民的利益趋同点,寻获该群体那种建立在身份认同基础上而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动力与行为。现阶段中国的国家利益可以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得到体现。在经济方面,明确中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和开放型经济体系,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在政治方面,明确了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尤其是提高行政制度运行的效率,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文化方面,则通过提高文化软实力,加快文化“走出去”,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海外利益还延伸到公民与侨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也触及“走出去”企业经济利益的保障以及由国家自身文化符号所承载的国家形象。

马斯洛需求层次论认为,伴随个体成长发展的动机是由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所组成。这些需要具有层次性并由低往高驱动发展。对于高技术新移民来说,其需求主要包括两个层次:安全需求、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安全需求是指高技术新移民在海外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需求,而自尊和自我实现则指他们能够跻身主流社会,凭借自身力量赢得社会尊重以赢得名誉和良好形象的需求。而对于中国来说,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贸易和移民的发展,中国的海外利益日趋多元化、复杂化,不仅包括经济利益、国家影响力,也包括海外华人的的人身安全和华商的公众形象。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和高技术新移民的利益在某些方面存在共享性和互补性。随着双方互动关系的日益密切,高技术新移民与中国的海外利益逐渐呈现出以下三个趋同点:

一是经济利益是中国海外利益的核心,也是高技术新移民维持跨国互动的基石。2010年,中国的GDP已居于世界第二位,贸易和投资关系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截至2009年底,1.2万家中国境内投资者已在境外设立1.3万家企业,遍布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对外投资累计净额(存量)为2457.5亿美元,其中利润再投资为816.2亿美元,占对外投资存量的33.2%,境外企业中方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随着海外经济利益的拓展,维护经济效益和安全、获取可持续发展条件成为中国海外利益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利益所在国国内问题、双边关系等原因的影响,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因此,中国需要巩固双边关系,加强合作,树立中国的良好形象。而高技术新移民中从事跨境经营与投资、自主创业者众多,经济利益无疑是其跨国流动的重要原因。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得这一群体加深与祖籍国的交往和互动,在崛起的中国带来的机遇中获取利益。随着经济

交往的加深，中国与该群体的利益日益交织在一起。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维护，有助于华商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生成与拓展，而华商网络的壮大对中国而言是一种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源，它们是中国拓展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生动体现和重要要素。

二是政治利益是中国海外利益的根本，也是高技术新移民的利益保证。中国海外的政治利益首先是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和政治制度的稳定，国家的稳定关系着企业和包括海外侨民在内的公民的安全。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国内国际、内政外交关系相互交织，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软遏制（soft balancing）战略，周边国家也开始警惕和防范中国崛起，中国的海外政治利益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因此，对内中国正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国家朝着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前进；对外中国正健全海外利益维护机制，并且积极塑造国家形象，成为“可信任的伙伴”。政治利益包含海外华人的生存和发展权益，如个体生存的自由、享受自由通行的权利以及危机环境下护侨机制的保障等。中国的政治稳定和良好的国家形象是海外华人利益的保证。稳定的政治和优化的中国形象为高端新移民注入了积极的公众形象，而高技术新移民与主流社会的互动则会传播中国的良好形象。在诸如台海危机、中美关系等大国关系发生起伏的时候，某些具有民族文化认同的华人科技团体还会自发捍卫祖籍国的政治立场和民族尊严。

三是文化利益是中国海外利益的基础，也是高技术新移民的情感纽带。文化是一个国家的价值符号，也是一个民族的情感纽带。中国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国的“和合”文化博大精深。但在西方媒体负面报道的影响下，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存在诸多误解。自 2004 年起，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以传播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融。据统计，截止 2012 年，中国已在 108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400 所孔子学院和 500 多所中小学孔子课堂。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必须充分利用公众的力量，通过大规模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推广取信于人，而海外华人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高技术新移民也希望华文国际地位的提升能赋予他们在社会经济生活当中更多的共同的文化认同力量以及创业就业技能，或者为其子女找到一个良好的华文教育环境。中国境内形成良好的公民道德文化氛围，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现代化发展，则有助于这些专业人才寻获成果孵化的平台。总而言之，中国文化的繁荣必将有利于该群体在内部拓展社会与文化资本，终而助益于经济资本。文化利益不仅是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技术新移民的感情纽带。（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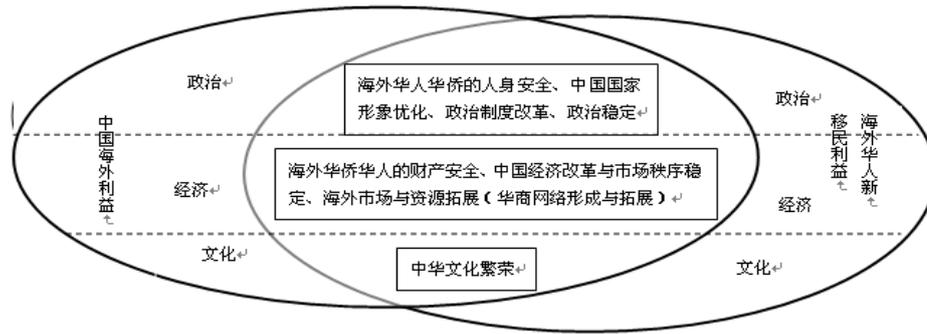


图 1：中国海外利益与华人高技术新移民个体利益的利益汇合点

利益的趋同使得高技术新移民对中国崛起表现出一定的关切，但客观上讲，该群体对中国的海外利益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认知差异：政治利益上，他们倾向于从西方主导的民主政治文明标准来审视和评价中国的政治状况，期望中国加快政治改革以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施以宪政实现政体的良治；在此基础上，提高政治运作的透明度和简化繁冗的行政审批制度，集中体现在海外归国人才的出入境定居和生活的户籍和社保等问题。¹⁰在经济利益上，该群体担忧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出现的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希望中国朝着完全市场经济体制方向加快改革，以此寻获一个良好的投资和技术推广的运营环境。文化利益上，该群体主张通过改变教育模式甚至是修正意识形态来扶正中国传统文化在民众道德方面的向心力，赋予民众精神信仰以此求得社会和谐；¹¹同时，期望中国的高等教育呈现均衡而自主发展，让更多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能够成为高科技人才将创意理念转化为现实商业项目的孵化平台。

12

三、中国侨务公共外交的机制化服务管理模式

侨务公共外交就是通过侨务渠道开展的公共外交。侨务公共外交在影响华侨华人的同时，又通过华侨华人的媒介作用，向外国政府和民众传达和介绍中国，以消除误解，增进了解、

¹⁰ 吴伟：《中共应把当年的政治承诺当“正资产”》，联合早报网，2013年8月15日，<http://www.zaobao.com.sg/special/zbo/story20130815-240893>。蔡逸儒：《从美国的棱镜计划谈起》，联合早报网，2013年8月1日，<http://www.zaobao.com/forum/expert/cai-yi-ru/story20130801-235488>。

¹¹ 参见薛涌：《“上流社会”的贱民 中国富人缺什么》，新京报网，2011年2月15日，<http://view.news.qq.com/a/20110909/000046.htm>。《海外华人中国梦》，侨报纽约网，2013年10月13日，<http://ny.usqiaobao.com/news/community/16864-2013-03-08-05-58-43.html>。谢春风：《中国人如何从绝对富裕走向相对崇高》，联合早报网，2013年8月12日，<http://www.zaobao.com.sg/forum/letter/china/story20130812-239995>。

¹² Xiang Biao, “A Ritual Economy of ‘Talent’: China and Overseas Chinese Professional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37, No.5, May 2011, pp.835

促进合作，从而维护和实现国家的根本利益。¹³这种外交蕴含了两大要件：一是华侨华人受到祖籍国的政策施动；二是对祖籍国政策作出反应后华侨华人在居住国起着“二次扩散”的作用。在这个传导机制和作用过程中，它其实预设了一个前提——华侨华人自身利益的满足。只有在其利益得以满足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在祖籍国政策的作用下作出积极反应，进而在居住国其他公众间正面传播中国的信息与文化符号。在追求自我发展过程中，高技术新移民自身利益同中国的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可谓休戚相关。该群体具备可携带技能并同中国发生了频繁的互动，该群体无疑是海外华侨华人中有关中国认知的“意见领袖”。

为充分发挥该群体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者作用，中国必须在满足高技术移民合法权益的同时谋划一套有效的侨务公共外交模式。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政策也适时做出了调整。我国政府对海外留学人员的方针政策从“回国服务”转向“为国服务”，各级地方政府为引进专业人才回国创业就业和服务出台了诸多优惠政策，并搭建起各种平台。但迄今为止，海外人才回国创业时仍然面临资金短缺、融资难、行政效率低下、户籍落实缓慢和子女上学等诸多难题。¹⁴为推动我国的人才环流，国内对完善我国移民规律体系，健全高科技人才引进政策和机制建设的呼声日见其高。在全球化时代，信息咨询和服务也丰富了公共外交的内涵，对侨民的服务理当成为侨务公共外交的应有之义。诚如外交部长杨洁篪所言：外交服务事业已经成为我国整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外交人员服务局局长钱洪山也表示，中国寄望于在为侨民提供服务的同时宣传中国，对外塑造一个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这也是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¹⁵该理念同我国“十二五”规划期间所提出的“为侨服务，涵养侨源”的侨务工作方针相吻合。对于高技术移民来讲，他们在同中国互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的利益诉求是相互交织的。该群体希望在中国政治稳定的环境下，逐步提高行政管理和服务质量。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同中国（地方）政府打好交道，有助于保障个体的流动性和家庭的稳定性；与此同时，乘着祖籍国经济发展的东风，善于借用中国政府搭建的诸如“留交会”、“华创会”等平台，努力构建与祖籍国教育和科研机构的良好关系纽带，或充分发挥跨国管理经验谋求更丰厚的经济效益，形成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这也从根本上提升这些科技人才的职业能力和社会竞争力，跻身主流并实现自我。

¹³ 《国侨办副主任何亚非：释放侨务公共外交巨能量》，中国新闻网，2013年10月16日，<http://www.chinanews.com/zgqj/2013/10-16/5385456.shtml>。

¹⁴ 曹善玉：《对有关华人高技术新移民政策的评述及建议》，《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第186页。

¹⁵ 董玉洁：《服务也是公共外交——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的50年》，《世界知识》，2012年第3期，第66页。

综上，我国的侨务公共外交模式体系，除了包含危机管理模式、国际公关模式和文化外交模式之外¹⁶，还理当本着服务的理念关切华人移民的利益需求，以一种机制化的服务管理模式扩宽公共外交的设计视野。

1. 加强联动机制：依托网络技术，优化面向高技术新移民的信息数据库和国际人才交流网络管理

一是立足海外科技人才的求学和职业规划需求对“神州学人”等相关网站进行优化的设计，在梳理好高层与地方的网络建设和栏目设置的基础上，形成网页链接和信息共享，构建海外科技人才、地方政府（侨联）、教育科研机构和企业四位一体的信息立交桥。

二是在实施诸如“春晖计划”和“千人计划”等人才引进计划的同时，定期走访海外华人科技社团，并对海外科技人才和相关学术团体骨干进行信息数据库管理，共同打造一个健全的咨询服务体系网络。

三是借助“社区”和“论坛”等网络技术，以开放的姿态加强同海外科技人才的对话和联系，密切了解其所思所欲，并及时反馈给当地政府。

2. 建立人才使用机制：在把高技术移民纳入我国的“外脑”智库建设工程的同时，加强技术开发项目合作机制，不断提升侨智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水平

首先，对于较为发达的沿海和省会城市，借助国际人才市场（猎头）和“留交会”的力量，聘请一批在科技创新、国际产业转移、产业竞争力和国际金融等领域的华人专家作为区域发展的顾问，尤其是大胆聘任那些国内较为紧缺的高层次人才担任政府领导和企业高管。

其次，在加快公共管理改革进度，赋予我国智库更多自主发展权力的同时，由各类智库根据学术领域的需要广泛招聘相关的海外高科技人才，携手探索相关的科研项目，共同献计献策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最后，在推动我国校企合作机制的同时，推动高校的创新实践和科技创新平台的软硬件建设。尤其是要强化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人才梯队建设，推动发明专业和成果的市场化进程，定期公布各阶段科研项目的信息资讯，为留学生等科技人才来我国相关教育和研究机构参与

¹⁶ 李德芳和李卫红在《中国公共外交模式探析》一文中，总结梳理了当前中国公共外交的三种模式，分别是“危机反应”模式、“战略沟通”项目模式和“文化外交”模式。笔者认为，中国的侨务公共外交也采用了相类似的三种模式。从目前的实践来看，侨务公共外交的运作模式可以归为三大类：一是国际公关模式，表现为中国高层会见海外侨领或侨团或者是举办“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等推介会以吸引海外技术人才来华创业就业。政府官员出席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回国创业研习班开班仪式，以举办培训班的形式为海外专业人士来华创新创业提供支持；二是文化外交模式，表现为深入华人社区推动文化艺术项目，增进华人移民群体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如自2007年创办以来国务院侨办已经在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个城市举办120场讲座“文化中国”的系列活动。该活动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国对外友好交流，丰富广大海外华裔文化生活，在海外侨界有着较高的声誉和影响；三是危机管理模式，如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利比亚、乌克兰国内局势动荡的时期，及时向侨民提供该国局势的信息，并给予及时领事保护。

技术开发项目合作提供信息平台。

3. 创建人才生活保障机制：不断提高有关行政部门的管理服务水平，及时了解和解决高技术新移民的工作和生活需求。

相关行政部门要树立公共外交意识和提高其管理服务水平，便利海外科技人才在中国境内的起居出行；同时，发挥侨务部门的渠道优势作用，与用人单位形成对接，及时了解高技术移民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此外，依托地方文化特色，组织针对性的留学生联谊会或海外科技人才恳谈会，交流经验、分享心得，了解其利益诉求，并及时协助其解决融入新环境中的有关困难。